

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07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四十二辑 2009.4

王五一 赌场为什么这么多？

邹至庄 贫富不均问题如何解决

刘国光 前30年和后30年——共和国六十周年感言

唐宗焜 1985：「《经济研究》变了」

俞宪忠 经济学家「挨骂」的是与非（上）

栗庆雄 遍栽桃李两岸春

黄有光 效益成本比较高的投资——刺激大脑享乐中心

郑联盛 学生到股民：游走于投资与投机之间

赖德胜 少壮不努力，老大何以徒伤悲

徐昌生 我为什么不肯配合纪检委？

徐康宁 四城印记

李文溥 从「下海」到「参公」

周业安 周末了，我们去哪家餐馆？

廖进中 杨小凯与湖南大学

卢周来 国共两党的「货币战争」

熊秉元 自然学经济？

赵世勇 斯坦福的中国学者和中国研究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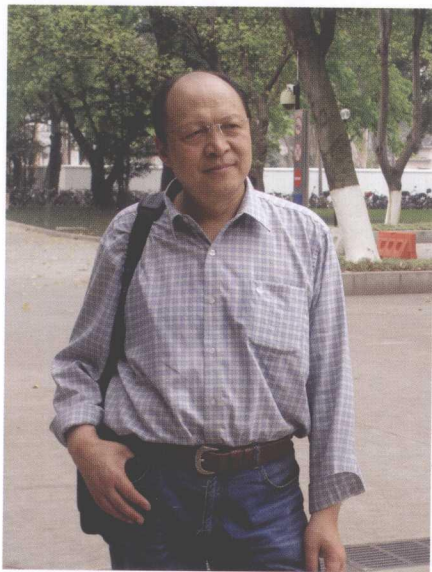
#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 “茶客”风采

巫继学，1946年生于成都市，1981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经济学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教授，联合国社经委培训中心DSC客座教授，德国霍恩海姆大学访问学者。个人独立学术网站：人本经济学—自主劳动网([www.economics.com.cn](http://www.economics.com.cn))(建于1996)。自认为个人主要学术成就有二：其一，首次提出并论证“自主劳动”范畴，形成自主劳动理论体系，从而以新理论论述了充足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1981)；其二，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人本经济学(Anthropocentric Economics)与物本经济学(Materialcentric Economics)的划分，力倡建立人本经济学理论新体系(1987)。



经济学是对人类经济生活的慧心创造。尽管都充满着灵性，但对经济生活的不同实际体验与理性抽象，创造出不同的学术流派来。迄今为止，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都把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面对刚刚从贫穷与饥饿挣脱出来的人类来说，经济学的创始期有理由以物为中心、为元本、为主体、为基点。这种对象取向的经济学，实质上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学。相反，我认为作为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必须将经济生活中的人作为对象，必须以人为中心、为元本、为主体、为基点来展开理论体系。这种对象取向的经济学，实质上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我创造了两个词，来表达我对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两类经济学的新划分：Materialcentric Economic 即物本经济学，Anthropocentric Economics 即人本经济学。人本经济学，在本质上就是探索人类经济活动背后的人性动因。

——巫继学



## 为什么要学经济学？

李俊慧

为什么要学经济学？最通常的一个回答往往是：因为想赚钱。

这自然是一个其实是不了解经济学本质的人所提供的答案，以为经济学是一门教人怎么赚钱的学问。

回顾历史，虽然经济学家中不乏像李嘉图、凯恩斯那样靠在证券市场上投资炒作而大富之辈，却也不乏像马尔萨斯（可能还有马克思）那样屡战屡败者，甚至还有像费雪那样一生精研利息理论、却恰恰正是在股票市场上最终大败亏输得身家破产的大家。另一方面，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却能在证券市场上一夜暴富乃至长盛不衰者，也多的是。

撇开可以最快速地赚钱的证券投资不论，赚钱当然还有很多门路。但企业家也往往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则往往做不了企业家。

由此可见，会赚钱与会经济学，本身是没有关联性的。这就犹如物理学家也许能精确地计算球状物体的运行路径，但优秀的足球、篮球、高尔夫球、桌球等的球类运动员并不需要懂物理学。

那为什么还要学经济学？

根据“经济”这个词语在中国古代的意义，人们又会提出另一个也很常见的答案：因为可以经国济世。

可惜，这又是一个不了解经济学本质的人才会提供的答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工程学，它的作用是解释世界，不是改造世界。再拿物理学来做类比吧。物理学家也许能把力学知识讲解得头头是道，但要建一座大桥的话，最好还是去请教工程师。

那到底为什么要学经济学？

我不知道别人的答案是什么，但我所见过的、我觉得最能反映我心声的一个回答，是英国著名的女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话：我学经济学，是为了不会受经济学家的骗！



## 经济学家茶座 (第42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项目负责人

责任编辑

董新兴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雒亚龙

### 【卷首语】

李俊慧 为什么要学经济学? /001

### 【国是我见】

王五一 赌场为什么这么多? /004

邹至庄 贫富不均问题如何解决 /008

刘国光 前30年和后30年——共和国六十周年感言 /010

曹利群 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 /012

孙文凯 如何看待经济学家的观点 /016

### 【学界万象】

唐宗焜 1985:“《经济研究》变了” /021

愈宪忠 经济学家“挨骂”的是与非(上) /026

粟庆雄 遍栽桃李两岸春 /033

荆林波 演讲者是如何炼成的 /041

刘福寿 今日文人:忍能对面为盗贼 /043

张永山 海棠树与学术生态 /049

### 【学问聊斋】

黄有光 效益成本比极高的投资  
——刺激大脑享乐中心 /052

巫继学 “经济和谐”理想的前世今生 /055

江春泽 回忆30年前两篇短文的写作背景 /060

皮建才 小桃园背后的道德困境和产权难题 /063

邹恒华 严建平 曾巩经济思想探析 /067

### 【经济随笔】

郑联盛 学生到股民:游走于投资与投机之间 /071

赖德胜 少壮不努力,老大何以徒伤悲 /076

詹 坚 从简历看机遇 /078

徐昌生 我为什么不肯配合纪检委? /080

詹宇波 《红楼梦》为什么要重拍? /083

- 杨 娟 养老随想 /088  
朱 玲 怀念不曾相识的丁聪先生 /091

### 【经济评论】

- 徐康宁 四城印记 /092  
李文溥 从“下海”到“参公” /097  
陈 宪 由“份钱”想到还利于民 /101  
刘宝宏 书价上涨的背后 /106  
俞炜华 生育管制、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的外汇储备 /111

### 【生活中的经济学】

- 周业安 周末了,我们去哪家餐馆? /116  
周勤 钱炳 中国人真的不讲诚信吗? /120  
李俊慧 足球中的经济学 /123  
寇宗来 “交通拥堵费”之辩 /127  
赵红军 花旗银行,让我吓了一跳的银行 /129

### 【经济学人】

- 廖进中 杨小凯与湖南大学 /132  
李华芳 克鲁格曼对中国行的双重抱怨 /135  
王永钦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故事”  
——与罗伯特·希勒教授一席谈 /138

### 【经济史话】

- 卢周来 国共两党的“货币战争” /143

### 【熊出没注意】

- 熊秉元 自然学经济? /149

### 【他山之石】

- 赵世勇 斯坦福的中国学者和中国研究 /151  
高新军 经济危机阴影下的美国地方治理 /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42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209-05038-8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第171066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012

E-mail: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172毫米×232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24-180

定价:14.00元



## 赌场为什么这么多？

王五一\*

地球变小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们日益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人类发明的各种“奇技淫巧”把这个地球的各个角落连接了起来。我们从中大受其益，因而也便当然地大声欢呼这“小地球”时代的到来。地球变小，在给人类带来了大方便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生活内容的方方面面。世界赌博爆炸的发生便是地球变小的结果。

退回半个世纪前，这个地球上只有三个主要赌城，亚洲的澳门，欧洲的摩纳哥和北美洲的拉斯维加斯。澳门 1847 年开赌，蒙地卡罗于 1867 年建立了其第一间赌场，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合法化则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这几个赌城选择以赌立命的生存方式，皆是由于其“非赌无他途以为生计”的恶劣的经济资源条件所致。在“大地球”的条件下，赌场的市场半径不长，吸引的“外财”不多，对其周边的影响有限。50 年前，从广州去澳门，连坐车带坐几番渡轮，得走一天一夜。要去趟拉斯维加斯，恐怕得用钱褡子背着金条漂洋过海几个月。正是彼时之落后的交通工具、落后的金融技术、落后的通信手段，把这个地球的各个部分相对隔离开来，使得这三个赌城能够基本上“于他无害”、“独恶其身”。其存在于世，善也罢，恶也罢，无人计较，无关宏旨，却倒也成了这个地球上的一种文化点缀。

世界历史上对赌博的善恶判断，就像中国人对人性的善恶判断一样，有过几千年的“性恶”、“性善”之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对赌博都持“性恶论”，政府一般也都持性恶论的立场。然而宗教之性恶说与政府之性恶说实际上大有不同。宗教认为赌博有害，是认为它对人类有害，永远有害；而政府认为赌博有害，是因为它对自己有害。如果赌博有朝一日变成于己有利，或利大于害时，其态度是可能改变的。在“大地球”时代，谁开赌，谁受害；哪里开赌，哪里受害。政府当然禁赌。政府们普遍的禁赌政策，也便为这些早期赌城的长期相安于世创造了条件。

然而，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人类的交通、通信、金融等领域的技术急剧进步，由此推动着旅游业迅速发展，进而使得赌博产业的外部影响力大大提高。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赌场的市场半径变得越来越长。博彩业的开放性、出口性、国

---

\* 作者系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际外部性、以邻为壑性逐渐明显起来。在“大地球”条件下“哪里开赌,哪里受害”的逻辑开始失效。自己开赌,他人受害的新逻辑开始形成。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理解到了赌博的新妙用。

当一国或一州或一城为了一己之利而开赌时,它会使其邻居的金融利益和社会利益遭受其害。受害地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做出反应而开赌。由此引起连锁反应,使开赌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开赌的地方越多,坚持不开赌的地方便受害越甚,其被迫开赌的压力便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了一种“逼良为赌”的机制。

于是,一场赌博合法化的浪潮于 70 年代萌生,80 年代成势,90 年代达到高潮。

是世界技术爆炸引发了世界赌博爆炸。世界各大洲赌博爆炸的高度同步就是证明。

以 1978 年大西洋城开赌为导火索,以 1980 年代联邦政府通过印第安人赌场合法化的法律为引信,以 1990 年代密西西比地区几个州的几乎同时开赌为正式标志,美国赌博爆炸。

澳洲的赌博爆炸几乎与美国同步。1970 年代以塔斯马尼亚州和北方领地两个州区开赌为第一冲击波,1980 年代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与南澳大利亚三个州开赌为第二冲击波。到本世纪初,剩下的三个州先后开设了赌场,至今,已实现了州州有赌场。

亚洲地区的“赌博爆炸”,与美国和澳大利亚非常相似,也是从 1970 年代开始的。1970 年代初,马来西亚、菲律宾与韩国先后开赌,为亚洲赌博爆炸第一波;1990 年代初,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缅甸等国先后开赌,是为第二波。进入本世纪,传统赌城澳门“赌权开放”,“澳门赌博爆炸”把亚洲赌博爆炸推向高潮。

如今,博彩业已经成为一个遍布全球的大型产业。2008 年,全球 4855 间各类赌场创造了超过 3000 亿美元的 GDP。

下表是 2008 年的数字,通过世界各主要地区博彩机构的数量,反映了目前世界博彩业的规模。

全球博彩机构分布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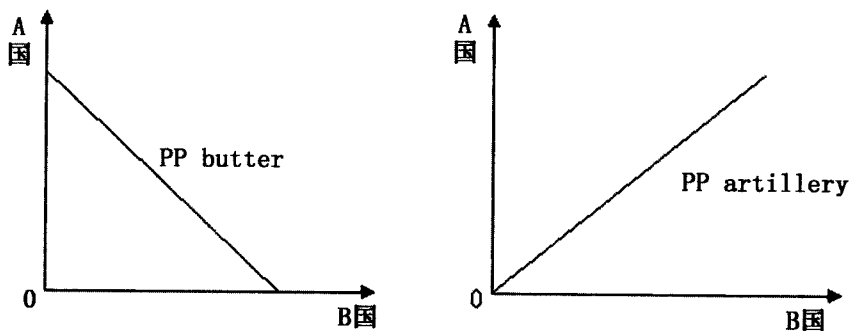
|        | 北美   | 欧洲   | 亚洲  | 中、南美 | 非洲  | 大洋州 | 加勒比海地区 | 其它  | 总数   |
|--------|------|------|-----|------|-----|-----|--------|-----|------|
| 博彩机构数量 | 1775 | 1709 | 183 | 282  | 173 | 490 | 118    | 125 | 4855 |



“大地球”时代的这三个原始赌城,现在成了世界赌博爆炸的受害者。本来,地球变小,赌场的市场半径延长,它们应当从中大受其益的。然而,在赌博爆炸中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日益遍布世界各地的赌场,吃掉了这些原始赌城的传统市场。世界上每多一个地方开赌,它们就少一个市场多一个竞争对手。没有人再可怜这几个原始赌城在自然资源条件上的先天缺陷,它们必须自己自强不息。这就是拉斯维加斯 80 年代进行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和本世纪初澳门赌权开放的历史大背景。

在“逼良为赌”机制的作用下,世界博彩业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了一种多多少少类似于军备竞赛的逻辑,并因此而当然地使赌业成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既由政府主导,其发展模式自然要从属于政府的利益动机。而许多政府在制订赌业政策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本国的博彩公司赚了多少钱,而是它能赚到多少外国人的钱,以及本国人被外国人赚去了多少钱。这种利益动机会对世界赌业之终极命运产生恶性影响。

下面用经济学喜欢的“黄油”与“大炮”的例子来帮助读者理解世界博彩市场的构造。左图是世界黄油市场的构造模型。它反映的是,在一个需求量既定的市场条件下,A 国与 B 国间可以在这个 45 度斜线上的任一点选择国际分工与分配关系。右图是世界大炮市场的构造,它反映的是,世界大炮的产量受 A、B 两国军备竞赛的驱使,而沿着曲线向右上方无限延伸。有趣的是,在世界博彩市场上,这两种市场机理共同起作用。我们因此将之分别称为世界博彩市场的“黄油机理”与“大炮机理”。



博彩市场上也存在“需求量”的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由供应激发出来的需求,由政策释放出来的需求,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使不存在任何法律、社会 and 道德意义上的约束,世界上也总有人不赌博。因此,赌博的终极需求

量可以看作是一个既定量。假如,当世界上半数人口的国家开放了赌禁的时候世界博彩市场实现了饱和,即全世界博彩产业的边际收益等于了边际成本,从而新开赌场已无利可图甚或亏本。那么,此时世界赌业的投资会不会因此而停下来呢?不会!因为,这剩下的一半尚未开赌的国家实际上是在受那一半已开赌国家的剥削。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他们不是为了赚别人的钱而开赌,而只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钱被别人赚去而开赌。他们不是为发财而开赌,而是为守财而开赌。剩下的尚未开赌的国家越少,这些国家开赌的迫切性就越大,如此下去,直到所有的国家都实现赌博合法化,世界实现彻底的“博彩全球化”。

换句话说,当世界博彩市场上的“黄油机理”的能量完全释放掉以后,“大炮机理”则会继续永恒地发挥作用,直至把事情推向极端。

更可怕的逻辑是,在事情走向极端以后,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使部分国家退出的经济动因。“物极”却不会“必反”,这将是人类的一个悲剧。彼时的赌场之对于国家,可能会像边境哨所一样,(事实是,迄今所见的各国、各州、各地所建的赌场,一半以上都建在邻居的边境上)成了其国家经济安全的一种设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退出都会是一种自我牺牲,而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做出这种自我牺牲。当所有的国家都有了赌场的时候,赌场也就不再像现在这样对于一些国家的游客来说是个新鲜玩意儿,因而具有正面的旅游经济价值了。在世界博彩业的经济价值被这个巨大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消灭以后,剩下的只是赌博的社会、道德的负面后果。

世界赌业的大发展,正在挑战人类理性。



## 贫富不均问题如何解决

邹至庄\*

一个常用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方法是所得税,即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的税来补贴低收入者。但是所得税政策有经济缺点,因为当人们努力工作来增加收入的时候,会被要求交更多的税,这会损害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一种更好的选择是消费税,它能合理控制消费,鼓励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的贫富不均问题,我建议提供一个市场来鼓励并促进自愿的收入再分配。事实上许多富人愿意帮助提高穷人的福利水平。慈善捐助在美国很常见,在中国也日渐盛行,特别是在惨痛的“5·12”大地震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促进慈善活动,那么中国的收入不均问题就可以得到改善。

最主要的是为慈善捐助提供一个更加方便有效的市场。这样,有心于慈善的人就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果有恰当的机会,很多人都愿意资助一些使穷人受益的项目。他们希望确保自己的资助用于好的项目,而且没有浪费。受捐者必须值得信赖,并能有效地将资助用于施助者认可的工作。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信息网络。我认为大的新闻媒体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交互式网站,让潜在的受益者和捐助者互相交流。这个网站可以根据项目的地址和性质列出所有潜在的受益者,其中地址可以详细到省、市、县甚至村,慈善工作的性质可以是支持乡村学校、医院或其他项目。地方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社会机构的领导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提案,说明其性质、目的和成本。同样的,每个潜在的捐助者都可以选择列出其愿意资助的项目的特性。提供信息网络服务的新闻媒体必须谨慎制定提案的格式和信息网络中的具体细节。

所有潜在捐助者可以在此网站搜索他们感兴趣的项目,并通过相关机构深入了解该项目。随后,捐助者和受益者双方可以根据他们选择的方式来达成协议,并商谈确定其他细节。接着,主办的新闻媒体会接到一份达成协议的通知和合同的相关条款(合同条款细节由主办方作具体规定和解释)。合同签订时,主办方有权

---

\* 作者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

决定是否对此服务收费。一般来说,收取一定的费用也是合理的。新闻媒体在网站上刊登了项目信息之后,就可以向提出项目的机构或捐助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协议达成之后,主办方还可以在项目运作第一年或前两年收取捐助总额的一个小小的比例,但该比例应不超过一个规定的上限。如果费用过高会引起捐助与受益双方逃避付费,特别是那些没有在此网络注册的捐助者,他们可以宣称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的。

主办新闻媒体除了提供信息网络外,还可监督捐助合同的执行。新闻媒体通过曝光不诚实或不满足条件的受益者,防止此类造假欺骗事件的发生,保证慈善工作的有效进行。此外,特别成功的事例也有机会被刊登在媒体上,这样像学校或者医院等项目的捐助者和管理者以及工作人员,都能得到相应的荣誉。当然,执行监督职能也使得新闻媒体在签订合同时收取费用更具合法性。

如我在上文中提到,使用所得税来平衡收入分配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负面因素。除了不利于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以增加收入外,政府运作的所得税系统也存在许多缺陷。首先,政府征收所得税的管理成本很高。其次,纳税人想方设法低报应税所得、寻找避税方法也会产生成本,包括用于保存税务相关记录的时间成本,付给律师和税务顾问的费用等。这个成本甚至比政府的管理成本更高。(除了收入再分配外,世界上很多国家还利用所得税的收入来支持政府行使其职能。本文的目的在于不干涉现有的税收制度的前提下,找到另一种合适的方法来促进社会收入再分配。)此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具有自愿性和非强制性。这样多方的福利都可以得到提高,不仅仅是受益组织或个人,还包括捐助者,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会损害任何他人的利益)。

最后,这样的慈善活动有利于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慈善捐助降低了贫富差距;从社会角度来看,人们于施助的过程和结果中获得成就感,于困境中受助而心存感激,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

(翻译助理:魏虹丽、滕玉娟、梁芳、陈齐辉、李霞霏)



## 前30年和后30年

——共和国六十周年感言

刘国光\*

今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作为今后继续前进时,需要思考的宝贵财富。

去年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我们当时着重强调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很有必要的。由于要突出后30年,对前30年的评价,就有不同的看法,这也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庆祝和总结后30年,乘机否定前30年,歪曲和抹黑党的历史,攻击丑化党的领袖,说什么要“抹掉1949年以后”,要“进行历史性清算”,“架上历史的审判台”,仇视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些无良学者,假借探索历史分期学术研究的幌子,提出中国自19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两个划时代的标志性历史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否定前30年。另有一些同志,虽然认可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但同时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之并列,说它同样开辟了一个历史时代。这种看法表面上抬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实际上无形抹杀共和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对共和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阶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总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划分历史时代的断代标志。

以1978年作为断代标志来画线,对比共和国的前后30年,往往会误导人们的判断。去年共和国成立59周年前夕,就有一位同志问道:“3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回答是:“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问一答,就勾销了前30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显然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建国以来的判断是不同的。决议中说:“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即使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遇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sup>①</sup>

在对外关系上,对前30年是“封闭半封闭”一说,谷牧同志在一篇文章<sup>②</sup>中指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毛泽东同志主张对外要“做生意”,要“实行友好合作”,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实践中也做了很多努力。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我国与西方世界经济联系松散,这不能归因于我国政策的失误,主要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

历史难免曲折。前30年的中国确实走过一些弯路,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有些过急造成的失误。如大跃进的急于求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文革”时期过左过乱的错误。但是这些缺点错误,盖不过共和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包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30年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成绩和成就是第一位的。

同样,后30年的中国,在取得经济发展的飞速跃进、人民生活的总体提高、进入世界经济和政治重要一极等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关系上发生了某些倒退,如三大差距拉开、贫富鸿沟扩大、道德水平滑坡等等,以及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上,发生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社会 and 自然问题,党和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缺陷同样盖不过后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后30年的缺点和失误是第二位的,后30年的伟大成就才是第一位的。

在共和国60周年之际,我们对前30年和后30年的辉煌成就和曲折失误,都应抱着客观的分析态度,决不能只用后30年的成就来对照前30年的缺失,更不能抑后30年而贬前30年。这是不公正的。共和国的60年,统一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给我国人民最宝贵的东西,也是社会主义。60年前,新中国如日东旭,跨入了社会主义时代。60年共和国经历了前后30年的两个阶段。前30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建立在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的。这两个阶段的辉煌成就和曲折道路,无不与社会主义血肉相连。60年后的共和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改旗易帜,人民也决不会让她改旗易帜,这是值得我们共和国的亿万子民欣慰和兴奋的。让我们欢呼: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sup>①</sup>《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8、199页。

<sup>②</sup>谷牧:《新中国前30年不开放是因毛泽东的失误的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载于《北京日报》2009年1月11日。



# 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

曹利群\*

2008年10月,我们党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时隔10年后再次聚焦农村,就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在文件出台前,有专家呼吁,土地产权改革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坎,应成为全会讨论的核心内容。有的说得更直白,呼吁全会大力推进土地私有化。在文件出台后,有专家解读说,土地流转是文件最大的亮点。在经过媒体这么一番热炒之后,社会上许多人还这么认为,包括一些贯彻落实文件的地方领导也这么认为。

其实蛮不是这么回事。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土地流转就一直在进行着。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1993年中央十一号文件又提出依法自愿流转的原则,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更是专门在第五节中用了12条讲土地流转,这说明土地流转在政策上一直没有任何障碍。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只是重申过去一直坚持的允许流转政策,并没有特别要加快推进的说法。凭什么说这是全会文件最大的亮点?

不是亮点,却解读为亮点。我倒不是怀疑这些专家水平不高,对政策的来龙去脉不了解;相反,我是怀疑他们的水平太高,通过媒体把握话语权,有意识地引导改革走向他们期待的方向。这个方向,可能是部分专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也可能是部分专家背后的利益集团所期待的方向。

在各方的“忽悠”与参与下,现在的土地流转,真有点“只踩油门、不把方向盘”的意思了。从1984年发轫,直到2007年底,全国农地流转面积也只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2%;到2008年,这一比重便已飙升到8.7%,一年之内整整提高了3.5个百分点。这速度,那还了得!更值得警惕的是,“土地入股”作为一种新的流转形式,正被各地认同和推广。据调查,目前在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主体中,农户占64%,工商企业占36%。按此推算,工商企业经营的耕地已经达到5719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13%。与此对照的是,农村集体经营的耕地面积不到全国的

---

\* 作者现居北京。

1%。因此,在各类规模经营主体中,工商企业排在了第一位。

“土地入股”,是对各地做法的概括,是一个新名词,有必要作个简单的解释。所谓土地入股,就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某企业,获得该企业股权,土地由原来的农民经营转为企业经营,农民要么进城要么成为企业雇员。土地入股,作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重要手段,在很多地方被作为一种创新被认同和推广,作为政绩来培育和推动。

从局部地区而言,土地入股带来的真是“帕累托改进”,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绝对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值得大力称道。从农民的角度来说,他们以股权得到分红;并获得自由身,能够进城打工或者进入股的企业打工,再得到一笔工资收入,他们从入股中获益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它们赢得了一个新的经营领域,获得农业规模经营的好处,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自然也获益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土地流转面积就是政绩,有必要通过企业的参与加快土地流转速度,企业是纳税主体,土地入股后它们多少能够得到一部分税收;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来说,在企业进行土地整理后,它们能够凭借整理所增加的土地获得免费的股权及其分红,自然也是“何乐不为”。各方都获益,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经济学家们要为此结果弹冠相庆了。

这样的好事在全国推开后,会有什么效果?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推算吧。假定全国土地流转率达到20%,其中的一半流转企业手中,那么,全国18亿亩耕地中,企业经营的会有1.8亿亩。现在我国平均每个农民拥有1.88亩地,大体上说,1.8亿亩地承载着1亿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先不说别的,要是把这1.8亿亩地交给企业,就必须解决这1亿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2008年底土地流转率达到8.8%,按照当年提高3.5个百分点的速度推算,只要3年多一点的时间,全国土地流转率就可达到20%。我们承认,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历史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必定要把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转移到非农产业。但是,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容不得犯下急躁冒进的错误,否则,就是“过犹不及”。

经验数据告诉我们,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新增就业100万人。当然,随着产业资本密集程度提高(用马克思的话讲,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个数字还在下降。假定我国未来几年每年GDP增长10%(这已经是一个不低的数字了),每年新增就业不过1000万人,4年新增就业也不过4000万人。这4000万人的指标,还不可能全用来转移农业劳动力,因为必然有一部分要优先用来解决大学生就业、安置转业军人等。2009年,我国毕业的大学生就有600万出头,以后4年内



每年的毕业生大体上也是这个数，现在积压的未就业的大学生还有 400 万左右。因此，未来这 4000 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中，要较好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得 2800 万个就业机会。算上转业军人等，留给农民的指标也就 1000 万左右。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3 年多时间内流转率到 20%，要有 1 亿农民转移出来，4 年内能够提供给农民的岗位不过 1000 万左右。还有 9000 万农民怎么办？要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就算是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一个月给个 80 块钱，大概一年也得 1000 块。9000 万农民，一年就得 900 个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就不是个小数字了。这个时候，企业家、经济学家会讲，社会保障是公共产品，这笔钱必须得由政府掏。把这 900 亿算到前面的逻辑中去，作为政府的成本，那么，政府就不见得能够从中受益了。“土地入股”也就不见得是帕累托改进了。局部地区的效率，累加到宏观层面，就是非效率。单从经济学而言，也好讲，就是“加总悖论”、“囚徒困境”。这还未考虑到，9000 万农民没有就业、不能创造财富，本身就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再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一下，这 9000 万农民，没有土地、没有就业，就是吃上低保、拿到入股企业的分红，也不见得安分守己。9000 万，可不是一个小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这个数字的国家也不过十来个。中间哪怕有 10% 即 900 万人“惹是生非”，这个社会也安宁不了。要是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社会问题就变成政治问题了！天哪，这个结果我想都不敢想，太可怕了！当然，我觉得可怕的，说不定还是某些人所期望的呢！他们有意识地“踩油门”，但不告诉你车往哪去！不告诉你可能会翻车！

说两句牢骚话，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还是得视野开阔点。不能用帕累托作为唯一的效率标准，不能因为局部的效率改进就大肆鼓吹要全面推广，不能单纯追求效率改进而不顾改进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制度变迁的效率标准问题，现在的经济学没有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前，不要到处张牙舞爪。当然，这几句只是牢骚，权当放了屁，不臭不响。

以上算的这些数，还不过是“沙盘推演”，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推测而已。还没有经历的事，不见得有说服力。当然，真要去经历，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了。看看别的国家的一些经历，就知道还是不经历最好。并且，鼓动去经历的人，在我看来，要么是“不明真相”，要么是“动机不纯”。

菲律宾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约 30 年的快速发展，被称为“亚洲典范生”，当时其现代化水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1898

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给菲律宾当起了老师,给菲律宾出主意,建议它依靠资本的力量来改造小农和农村,土地入股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菲律宾也听话,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步通过入股等方式,打通资本进入农业的渠道。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了菲律宾农村金融、农业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农资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农民不仅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不得不交出经营权,以入股的形式交给企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破产,不得不涌入城市,被迫成为资本家的工人。许多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经过半个世纪后,失业问题逐步升级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最后又制约着经济问题的解决。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在今天的菲律宾,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 10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背井离乡,有 800 万人在海外打工,仅香港就有 70 万菲律宾女佣。今昔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美国作为菲律宾的老师,鼓动菲律宾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资本对农业的改造。它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干的呢?不是。美国一直限制资本进入农业,也限制土地入股。到现在为止,美国由企业经营的农场为数很少,一直维持以家庭农场为主的格局。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2007 年出版的 Family Farm Report,2004 年美国农场有 211 万家,其中 206 万家为家庭农场,占总农场数的 98%。家庭农场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之 85%,经营面积占农业总经营面积之 94%,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 183 公顷。可以说,在美国农业经营中,存在着资本,但这些资本是家庭支配下的资本,资本是农户家庭赢利的工具。在日本和我国台湾,也是这样的,但是家庭经营规模小,于是组建起农协,以农户家庭的联合来支配资本。在农业领域实行劳动支配资本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城乡收入差距都不大,都没有因此引发社会问题。我国专家们鼓吹的土地入股,是要把农民的土地交给资本家去支配,要把土地变成资本赢利的工具,这些赢利还主要归资本家占有。美国不做的事情,叫菲律宾做了。日本和我国台湾不做的事情,有人要我们做。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凭什么就做?!

就土地流转说了这么多,很多超乎了经济学的范畴,只能说明自己的经济学知识较为欠缺。聊以自慰,拟个标题,叫做流转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立场上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上了点现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东西。当然,这两个我都只是懂了点皮毛。但有一点,不讲政治的经济学是肯定不行的。